

檢查委員會，亦於是日舉行中央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選弗·特·伊凡諾夫爲主席，弗·伏爾金涅茨爲副主席。

## 分析意見

蘇聯共青團爲俄共對外擴張侵略、對內控制和奴役人民的幫兇。其組織結構，思想理論及其活動目標，幾乎完全效法俄共，亦步亦趨，所不同者，共青團是偏重於青年、少年與兒童方面的活動而已。目前共青團擁有二千三百萬團員，組織遍佈全國，有完整訓練機構與出版事業，有一龐大的社教工作，並在全國設立了起帶頭作用的突擊建築工地八十處，這自然是團的力量表現，不過共青團對於團員和青年人的思想領導，是非常脆弱，問題重重，這可拿柏伏諾夫在總結報告中所講的三段話來作說明。

○「最近幾年派到畜牧場工作的男女青年有幾十萬人，而離開牧場的有多少人呢？大致與此數相等，甚至還要多一點，這在大的程度上應如此解釋，因爲共青團許多團部，對於建立青年畜牧人員的勞動條件，進修與休息條件，沒有予以充分的注意。」

這一段話說明青年畜牧人員，對生活已有所選擇，不完全接受共青團的控制，派到畜牧場幾十萬男女青年，當不滿意畜牧場惡劣的待遇和生活時，

便可全部離開，而共青團亦無可奈何！

○「我是這樣瞭解：假定你認爲團對你沒有任何好處，那你就離開吧，不要拖延就立刻離開，因爲你在團內沒有碰上什麼，因爲團的生活對於你是一個包袱，是一個多餘的，是一個不需要的，沈重的負擔。如果團員對於團毫無貢獻，那你這個團員，是意志薄弱的懦夫，不是鬥士，是偽善者或者是自私自利者，這兩種情況，無論是那一種情況，你都是在團內湊數，你口袋裏還裝著團證，那簡直是太冤枉。」

這一段話，很明顯地透露今天蘇俄共青團內部的團員，不滿意團的組織生活，已大胆地在檢討團員與團組織的關係，檢討團對團員有什麼好處。

○「要同陳舊的、過時的、從來不自動消滅、而頑強抵抗的、長期存在的種種惡習病態：冷酷、懦弱、自私自利、貪污、酗酒、流氓無賴等現象鬥爭。」

這一段話說明蘇俄青年思想意識的消極與個人放任，是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也可以說，蘇俄青年思想意識，是腐敗墮落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整個說來，蘇俄今天的青年，是已相當覺醒，對個人生活和出路，對團的組織關係，業已有所選擇，不完全像史達林時代的盲目服從，任意由共青團擺佈，而傾向於個人的自由活動，這自然是蘇聯共青團在青年羣衆中間思想領導的失敗。

# 現階段共匪文藝整風之剖析

汪學文

## 一 前言

最近半年來，共匪整風運動發展的特點，是以吳晗及其所作「海瑞罷官」爲基準和中心，由點而線，由線而面，不斷擴大，逐漸提高。一方面從學術觀點，批判吳晗的清官論、道德論，進而展開所謂「史學革命」，對歷史作全面的清查和改寫；同時並揚言展開所謂「文化大革命」，企圖清除一切傳統觀念、整個傳統文化，以及所有傳統風俗習慣。另一方面則從政治觀點

現階段共匪文藝整風之剖析

，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背景與目的，並進而清算「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對「三家村」及其分店作全面的圍剿與整肅，逐漸地形成爲關係到匪黨命運、前途、和將來面貌的「頭等大事」。

## 二 從「海瑞罷官」到「海瑞上疏」

五十四年九月，毛匪在一次匪黨中央會議上，再度指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十一月，匪「文匯報」在上海匪黨組織的策劃下，首先

發表了姚匯文元作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批判吳晗的序幕。匪「解放軍報」立即予以轉載，並肯定地直指「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其勢極為兇猛，因而從政治觀點批判之文章，接踵而至，絡繹不絕。共匪之集中大力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當然是有計劃的，而吳晗於當時當地選擇海瑞作為研究對象，並連續發表有關海瑞的文章，顯然也不是偶然的事。它不僅有時代的因素，而且有社會的背景。

海瑞的時代，吳晗在「海瑞的故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作）中曾指出：是明朝從全盛走向衰落的時代。「他生在正德九年，死於萬曆十五年（公元一五一四—一五八七年），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個皇帝，這幾十年中，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土地更加集中了。皇帝侵奪百姓的土地，建立無數皇莊，各地親王和助戚、貴族、大官僚都有莊田，親王的莊田從幾千頃到幾萬頃。……農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奪，淪為佃農、莊客，過着牛馬般的生活。莊園的莊頭作威作福，欺侮百姓」。因此，吳晗特別強調：「這個時期，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時期」，「這個時期是政治最為腐敗、貪污成爲風氣的時期」；「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榮景象，骨子裏却蘊藏着被壓抑的千千萬萬農民的憤怒，一觸即發」。

而吳晗研究發表有關海瑞之文章和劇本的時間，是四十八年六月至五十年一月。戚本禹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國人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地向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邁進，但是也有人對這樣的革命運動極不滿意，極不舒服。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尋找機會，向革命發動進攻。一九五九年，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遇到了暫時困難，國際上的各種反動勢力，聯合起來發動了反華的高潮，國內反對社會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產生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思潮的社會根源」；周匪恩來亦曾指出：「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國內的階級敵人又一次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當時，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麼『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幹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因此，共匪認爲「蕪吹一種抽象的、罵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吳晗同志，正是適合這種社會思潮需要的代表」，指其「海瑞罵皇帝」影射「彭德懷罵毛澤東」，而「海瑞罷官」的主題思想，則是同情、

讚揚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激勵他們「失敗了再幹」，並鼓吹「退田」、「平冤獄」、煽動「單幹風」、「翻案風」。（註一）並指出「海瑞罷官」與「海瑞罵皇帝」，「罷」、「罵」，都是毒草。事實上，吳晗在「罷」與「罵」上，確是露骨的、大膽的。他在「海瑞罷官」的「本事」中，會明白指出「這個戲着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的不爲強暴所屈，不爲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在這場鬥爭中，海瑞罷了官，但他並不屈服，不喪氣。當時人民因爲他做了好事，擁護他，歌頌他。海瑞的地位在歷史上是應該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註二）顯然這不是「爲古而古」，而是要「古爲今用」的。而在「海瑞罷官」的劇本（共九場）中，吳晗不僅在消極方面寫出當時鄉官的專橫和民間的疾苦，而且在積極方面宣揚了當時人民的變天思想與反抗精神：

### 1. 鄉官專橫

「魚肉鄉官滿朝嚷，  
可知百姓吃糟糠？

民爲邦本口頭講，

祖官虐民好人裝。」（第九場——罷官）

「鄉官強暴百姓窮，

如狼似虎田野空，

魚肉鄉官真說夢，

將我罷職理不公！」（同上）

「青天白日搶劫良家婦女，打死人命，這是什麼世界？

王法何在？天理何在？」（第一場——民憤）

### 2. 民間疾苦

「一家人只靠你作稼耕田，

晨披星夜戴月早起晚眠，

養牛羊種桑麻終年勞苦，

完苛稅苦度日備受熬煎。」（同上）

「費錢財營齋醮庶政堵塞，萬民怨刀兵起四海困窮，嘉靖號民間說家家皆淨，（按即「十室十空」）再不改危社稷難對祖宗。」（第三場—上任）

「惡鄉官貪殘吏摧殘鄉黨，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鄉，民已窮財已盡國脈琢喪。我海瑞報聖上要作主張。」（同上）

### 3. 變天思想

「今日裏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第六場—斷案）

「鄉官殘暴過虎狼，強佔民田逃稅糧，江南困苦淒涼相，不退佔田不久長。」（第七場—求情）

「天寒地凍風蕭蕭，去思牽心千萬條，海父南歸留不住，萬家生佛把香燒。」（第九場—罷官）

### 4. 反抗精神

「哼！哼！哈哈，哈哈！烏紗帽嗎？海瑞死都不怕，何況區區一頂烏紗帽！喏！喏！（取下烏紗帽）」（第七場—求情）

「大丈夫頂天立地，豈可怕殺身之禍，便徇情枉法，做個沒廉鮮恥之人。」（第九場—罷官）

從其內容看，吳晗不僅為彭德懷唱「贊歌」，而且顯然有「為民請命」

現階段共匪文藝整風之剖析

和鼓舞人民的變天思想和反抗精神的政治目的。由于當時「宣揚復古」、「借古非今」已經形成一種「社會思潮」（註三），這種贊揚和鼓舞，能引起社會的共鳴，這是共匪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基本原因。

至于在「罵」的方面，吳晗在「海瑞罵皇帝」中，引述了海瑞罵嘉靖皇帝最厲害的幾句話說：

「現在人民的賦役要比平常多許多，到處都是這樣。你化了許多錢，用在宗教迷信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弄得老百姓都窮的光光的，這十幾年來鬧到極點。天下人民就用你改元的年號嘉靖，取這兩個字音說，『嘉靖』皆淨，家家窮得乾乾淨淨，沒有錢用。」

「天下的人不滿意你已經很久了，內外大小官員誰都知道。……你的心迷惑了。過于苛斷，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為是，拒絕批評，你的錯誤太多了。」

吳晗並指出：「這樣大膽直接罵皇帝的話，不僅嘉靖當了幾十年皇帝沒有聽見過，就是從各朝各代的古書上也很難找到。但却句句刺痛了他的要害，嘉靖又氣又惱，十分冒火。」如今大陸人民正是「家家窮得乾乾淨淨，沒有錢用」，而毛澤東雖為無神論者，不迷信宗教，但却迷信武力，迷信權術，自以為是，拒絕批評，錯誤亦太多了。因此，海瑞的話對於今日大陸以及毛匪澤東，已不是隱晦的影射，而是明確的寫照，也句句刺痛了毛匪的要害，使毛匪也又氣又惱，十分冒火。這是共匪要清算吳晗的另一基本原因。

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和「海瑞罵皇帝」之餘，共匪「解放日報」於五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發表了丁學雷的「海瑞上疏，為誰效勞？」一文，五月廿六日又刊登了方澤生的「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一文，對「海瑞上疏」亦展開批判，指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向黨進攻的『全國一盤棋』中的一支毒箭」。「海瑞上疏」係偽上海京劇院集體創作，由許思言執筆，該院正副院長周信芳（麒麟童）陶雄均曾參與實際編導工作。該劇是為匪偽政權成立十週年「獻禮」而創作的（第一次上演于四十八年九月），但其內容却亦是影射大陸人民悲慘真象，並咒罵匪黨與毛酋：

1. 大陸民情——「家家戶戶，乾乾淨淨」、「生計瀕危」、「流離顛沛」、「無家可歸」、「天災人禍，遍地哀鳴」、「怨聲載道，人人咒罵當今」、「人間無異地獄門」、「今日已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人心越發不可

收拾了」。

2. 咒罵匪黨中央「無道」、「有頭如同無頭」、要匪黨「向天下百姓謝罪」、「要將他們拉下馬」。

3. 咒罵毛匪為「濫施淫威、專橫暴戾、寡恩薄義的暴君」，已「病入膏肓」，連「肺腑都爛了」。聲稱要「醜翻灌頂、冷水澆頭」，並且要舉起「當頭棒」，把「昏君」打得「吐血」、「奄奄一息」，「最後乾脆連棺材也抬上台來示威了」。——共匪認為這是「搞反革命的示威請願，進行顛覆活動」。

五十年年底，在吳晗的「海瑞罷官」演出後，「海瑞上疏」亦曾搬到北平公演。因此共匪批評他們是「一南一北」、「一罷一罵」、「一個進攻、一個反撲」，「『全國一盤棋』下得實在緊湊，兩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逆流正好在這樣的時刻合流了」。

這盤「棋」之所以下得很緊湊，據說是由于匪黨中央宣傳部的一名副部長做「靠山」，他不但為「海瑞上疏」出點子、送資料，而且在看了這個戲的演出以後，親口稱讚為「好戲」，為它作了肯定的結論。這名副部長就是主管文藝工作的周揚，業經共匪清算。

其實，所謂「全國一盤棋」，並不限于南北兩海瑞，其他各地，亦有借戲言志，以古諷今者，例如匪江西省文化局長施龍賀（晉），即會改編「冤獄」、「尉遲恭」、「市民歡笑」、「紅娘子招親」等劇本，一面宣揚人性論、階級調和論，一面與吳晗的「海瑞罵皇帝」相呼應，足見寫歷史劇在當時的文藝界形成了一種風氣。

### 三 「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

「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乃是「海瑞罵皇帝」與「海瑞罷官」的「續篇」，時代相同，背景相同，主題思想亦大致相同，而吳晗就是其中三個作者之一，也會參與其事。因此，共匪指出：「『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是一脈相承的，貫穿着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同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華大合唱相呼應，同國內地富反壞右的復辟活動相呼應，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在一起露骨地向黨猖狂進攻，妄圖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改變顏色。」（

註四）

「燕山夜話」係鄧拓所作，共一百五十三篇，內一百五十二篇以馬南邨筆名發表于民國五十年三月至五十一年九月的匪「北京晚報」。其中一百五十篇，由「北京出版社」分五集出版。另有「陳絳和王耿的案件」、「鴿子就叫做鴿子」、「今年的春節」等三篇，據說因為「作者心中有鬼，未收入集子」。

「三家村札記」係從民國五十年十月至五十三年七月，發表于共匪「前線」雜誌的雜文，共六十七篇，署名「吳南星」，吳是吳晗、偽北平市副市長，南是馬南邨，即鄧拓，匪黨北平市委書記處書記，星是繁星，即廖沫沙，匪黨北平市委統戰部長。

匪「解放軍報」及「光明日報」于五十五年五月八日同時發表林匪杰等所編「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一文，引用「燕山夜話」及「三家村札記」之雜文二十三篇，分為五類批判：

1. 「惡毒地攻擊我們偉大的黨」；
  2. 「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攻擊無產階級專政」；
  3. 「為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喊冤，吹捧他們的反黨『骨氣』，鼓勵他們東山再起」；
  4. 「狂妄地叫喊要我們黨趕快下台『休息』」；
  5. 「『燕山夜話』假介紹『知識』之名，行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實」。
- 匪上海「解放日報」及「文匯報」于五月十四日又同時發表鮑匪尉文等所編「請看『三家村』的反動真面目」一文，引用「燕山夜話」及「三家村札記」之雜文五十二篇，並分類如下：

#### (一) 「燕山夜話」部份

1. 「惡毒地攻擊我們偉大的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黨的總路線」；
2. 「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千方百計地推行『和平演變』的陰謀，鼓吹資產階級的文藝、學術、教育路線，反對與無滅資的文化革命」。

#### (二) 「三家村札記」部份

1. 「惡毒地攻擊我們偉大的黨，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2. 「宣揚地主資產階級的腐朽意識形態，在思想領域中推行『和平演變』」。

』的陰謀，反對文化革命，爲牛鬼蛇神復辟辟鳴鑼開道。

「燕山夜話」及「三家村札記」共計二百二十篇，上述兩文引用者共計五十六篇（重複者及刊于「光明日報」者未計），約佔百分之二十六，似非斷章取義。因此值得研究。其內容雖可分爲數類，但主要者，佔篇幅較多者不外兩類，一爲「攻擊黨的領導」（即反毛），一爲「爲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喊冤」（即支右）。而這兩類也就是「一罷一罵」，與「海瑞罷官」和「海瑞罵皇帝」，確是「一脈相承」、「彼此呼應」的。茲摘要簡介如下：

（一）「攻擊黨的領導」（反毛）部份：

1. 攻擊毛匪「愛說偉大的空話」，咒罵「東風壓倒西風」是「陳詞濫調」。

所謂「東風壓倒西風」，是毛匪澤東于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說的，「東風」係指「無產階級和亞非拉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西風」則指「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勢力」。據說黑魯曉夫亦反對毛匪這一論調，他曾說：「必須更勇敢和堅決揭露關於荒唐無稽的『西風和東風』的競爭的教條主義理論」。因此，共匪批判鄧拓等不僅攻擊毛匪，而且「同黑魯曉夫唱的是一个調子」。

2. 辱罵毛匪「言而無信」、「不堪信任」，患了嚴重的「健忘症」、「必須趕緊完全休息」。

共匪認爲吳南星的「專治『健忘症』」一文是「一篇咬牙切齒地攻擊我們偉大的黨的雜文」，「用心凶狠毒辣」；其實，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健忘」、「喜怒無常」、「發火」、「瘋狂」等等，與毛匪的「症狀」完全一樣，顯然又是在罵毛匪，他不僅把毛匪罵得「狗血淋頭」，而且還想用一根「特製的棍棒」，把毛匪打昏。這與「海瑞上疏」中的「用冷水澆頭」、「舉起當頭棒」、「要把昏王打得吐血、奄奄一息」也是相呼應的。因此，方匯擇生不禁驚奇地說：「這些反黨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語言，何其相似乃爾！」

3. 攻擊毛匪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自以爲是」，「害己、害人、誤國」。

五十一年一月，吳南星在「前線」雜誌發表了「趙括和馬謖」一文，謂

現階段共匪文藝整風之剖析

趙括和馬謖，都「吃了主觀主義的虧，吃了教條主義的虧，自以爲是，光憑書本知識、理論知識，不顧客觀形勢，不聽有實踐經驗人們的勸告，結果是摔了大跟斗。……光憑書本上的理論，自以爲是，因而失敗，害己、害人、誤國的教訓。時間雖然隔得很久了，今天重來溫這些教訓，看來還是有益的。」

鮑匪蔚文等指認這是攻擊毛匪的，並謂這種攻擊是很「猖狂」的。

（二）「爲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喊冤」（支右）部份：

1. 爲被罷了官的明代戶部尚書李三才辯護：

在「爲李三才辯護」一文中，鄧拓說：

「在北京的歷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跡，似乎久已被湮沒了。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遺憾的事情。」

「據明代『神宗實錄』的材料，李三才於神宗萬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曾一再上疏，陳說礦稅的弊害。他大胆地揭發了太監利用征收礦稅的名義，大肆勒索，爲非作惡的罪行。萬曆三十年和三十二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對礦稅，並且提議修浚河渠、建築水閘、防治水旱。這些主張都沒有被採納，反而被『奪俸五月』。」

「當然，在那個時候還出現了攻擊封建黑暗政治的『東林黨人』，而『三才與深相結』。因此，當時有一班頑固腐敗的勢力，極力攻擊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黨人，同時也極力攻擊李三才。後來魏忠賢的一伙人，更把李三才和東林黨人同樣當做不共戴天的仇敵，那是毫不奇怪的。」（按：鮑匪蔚文等在本文後特別註明：「東林黨是明代由在野的官僚政客等組成的地主階級反對派」。）

「從他生前死後的這些事實中，我們對於李三才的一生爲人雖然不能認爲全無缺點，但是，他總應該算是一個正面的歷史人物啊。」

共匪認爲「這位李三才是海瑞式的人物」，因此，這篇文章「爲李三才辯護是名，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喊冤是實」。

鄧拓不僅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東林黨，他在「事事關心」（五十年十月五日發表于「北京晚報」）一文中，還特別介紹了東林書院的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東林黨人讀書、講學都「有他們的政治目的」，說他們很有骨氣，並借東林黨人當

時欲奪中央政權的政治抱負而隱示「三家村」的政治前景，要人們「關心國家的大事和全世界的事情」。

此外，他在「歌唱太湖」（四十九年九月七日發表于「光明日報」）一詩中，更宣揚了東林黨「力抗權奸志不移」的反抗精神：

「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力抗權奸志不移，東林一代好男兒！」

攀龍風節揚千古，字字動心絕命詞。」

因此，共匪認為「鄧拓之流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中搬出東林黨來，大肆鼓吹東林黨的叛逆性格」，乃是「給他們的一伙鼓勵士氣」，「顯然這也是政治目的的」。

2. 宣揚米萬鐘為政清廉，關心民刑，屢評時事，頗受中下層人民稱頌，為此遭到罷官。

鄧拓曾經寫過「宛平大小米」一文；共匪認為此文是「借米萬鐘這個亡靈，再一次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喊冤」。

此外，鄧拓尚曾在「光明日報」發表「談李鐔和他的畫」（五十年二月十四日）與「鄭板橋和板橋體」（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兩文，為李鐔、鄭板橋被罷官而鳴不平。因此從五十年至五十二年，鄧拓會四次為被罷了官的人鳴不平，歌頌他們被罷官而不屈服的反抗精神。

在「罷官」問題上，鄧拓寫過四篇文章，而吳晗除寫「海瑞罷官」外，在五十年六月七日尚寫過一篇紀念明代被罷了官的于謙的文章，並註明他是「兵部尚書」，等於「國防部長」。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目的的，也是「全國一盤棋」的。由於「彭黃反黨集團」的餘黨仍有相當的勢力，而且有其社會基礎，他們的「罷官」文章，實擊中了共匪的要害。因此共匪指為「鼓舞士氣」，從事「顛覆活動」，而且對於「罷官」問題特別敏感，例如「北京出版社」之出版「蘭亭墨迹匯編」八種，也被列為「罪狀」之一，指出「該書出版于一九六四年不是沒有原因的。『蘭亭序』寫于王羲之罷官之後，充滿『悲夫』『痛哉』的哀傷悲憤情緒」，這正是「當時『三家村』兄弟們暗淡心情的寫照」（註五）。郭沫沫若也會寫過關於考證「蘭亭序」的文章；郭沫於四月十四日作過一次「自我批評」，承認「沒有把毛主席思想學好」

、過去所寫的幾百萬字，「沒有一點價值」，「應該全部把它燒掉」。郭匪在三十年代與周揚等合唱過「國防文學」的調子，如今周揚已被整肅，郭匪的被整肅當只是時間問題了。屆時他的罪狀可能也包括考證「蘭亭序」在內。

在「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中，除了「反毛」和「支右」的文章外，還有很多被共匪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和「在思想領域中推行『和平演變』」的陰謀，反對文化革命」的文章，例如：

1. 在「陳絳和王耿的案件」一文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指出匪偽政權「吏治已經日趨腐敗」。

2. 在「一個雞蛋的家當」及「愛護勞力的學說」二文中，反對匪黨的總路線、大躍進、饑匪「用空想代替了現實」，把「一個雞蛋的家當」「打得精光」，並斥匪不懂得「愛護勞動力」。

3. 在「今年的春節」與「放下即實地」二文中，指出「大地很快就要解凍了」，共匪末日已近。咒罵不肯「放下」就等于瞎子，諷匪不必把持權力。

4. 在「科學話與科學事」一文中，攻擊匪黨「言而不行」、「言行不一」，不講科學，不接受遺產「造成損害」。

5. 在「多用心」一文中，指責匪幹只會耍「太極拳」、「只希望自已越省心越好」，「無形中造成了一股歪風」。

6. 在「談讀書」、「談興趣」、「有書趕快讀」等文中，鼓吹「成名」、「升級」、「培養興趣」，並指點青年治學的道路，共匪認為其目的在使青年變成「三家村」推行「和平演變」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工具。

這些文章與「反毛」和「支右」的文章相較，雖屬次要的，但也均是以談歷史、傳知識、講故事、說笑話等方式，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向匪黨及匪偽政權作全面性的攻擊。因此，共匪認為這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箭」。

共匪指稱寫歷史劇是「全國一盤棋」的，而雜文亦然，在大陸上會盛極一時，並不限於「三家村」的作品。例如匪黨中央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立羣曾在「成都日報」及「成都晚報」發表「巴山漫話」，陳博霖在「重慶日報」發表「巴山夜話」；匪黨江蘇省委兼宣傳部長陶白曾撰「燈下漫記」等

雜文，匪「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夢兆會撰寫「烟雨漫談」，匪「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會撰寫「藝海拾貝」，匪偽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政治部主任楊述亦會化名文淑陽在「北京晚報」發表「青春漫話」雜文，共匪指這些雜文都是「三家村黑店的分號」，一致反毛反共。毛匪會謂魯迅型雜文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上述諸作家們却與毛酋大唱反調，紛紛撰寫雜文，其目的均在針貶現實，批評或影射匪區不合理的現象。

#### 四 「抓壯丁」與「紅日」

「抓壯丁」與「紅日」是兩部電影，前者係匪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後者係匪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攝製。上演時均會獲得民衆以及匪幹的好評，而現却遭到共匪的清算。類此情況之電影業已超過十部，共匪第一次文藝整風的批判對象就是電影「武訓傳」（孫瑜編導），被指爲宣傳改良主義和投降主義的片子。而這一次整風，其所批判的電影特別多，計有陽翰笙編的「北國江南」、匪北平電影製片廠根據柔石小說改編的「早春二月」、夏衍根據茅盾小說改編的「林家舖子」、柯靈編的「不夜城」、白刃、林農編導的「兵臨城下」、陳戈根據川劇改編的「抓壯丁」、瞿白音編的「紅日」、林谷、徐進、謝晉合編的「舞台姐妹」、周萬誠、方德合編的「逆風千里」、于伶、葉明、謝晉、梁延靖合編的「大李、小李和老李」、趙劍秋編導的「孫安動本」、以及梅阡、孫敬合編之「桃花扇」等十二部。共匪批評這十二部電影的理由和罪狀，約可分爲三類：

第一類是歌頌清官與氣節，爲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出謀獻策、爲資本主義復辟進行輿論準備。如「孫安動本」、「桃花扇」等是。

第二類是宣揚人性論與溫情主義，強調階級調和，反對階級鬥爭。如「北國江南」、「林家舖子」等。

第三類是醜化勞動人民、醜化匪軍，爲地主及國軍唱讚美詩。這類電影可以「抓壯丁」和「紅日」爲代表。

「抓壯丁」影片是描寫抗戰時期，在四川某地農村，保長征兵拉伕的故事。共匪批判這部電影的主題是醜化勞動人民，混淆敵我界線，掩蓋階級矛盾，爲地主階級伸冤訴苦，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唱對台戲，並且打着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幌子，反對毛匪的文藝政策（註六）。

匪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在「透骨的解剖」一文中，特別推荐這部電影，並要從事戲劇工作者加以研究，因而共匪在清算陳其通時，對該文會予批判，指其要旨是在反對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的方針。

「紅日」的影片是描寫三十六年國軍與匪軍在山東沂蒙山區孟良崗作戰的經過。編導者透過藝術手法，揭露匪軍素質的窳劣及指揮的愚昧無知，同時，把國軍的英勇壯烈和堅強不屈的精神，予以公正的評價。因此共匪批判這部電影不僅暴露了匪軍官兵間的矛盾，並且頌揚國軍精神團結，不僅鄙棄毛匪軍事思想，而且讚揚國軍的戰略戰術。（註七）瞿白音編的「紅日」被批判後，其所著的「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旋亦遭批判。該文的中心論點有四，即「去陳言」（按指去毛匪思想）、「破三神」（破主題之神、結構之神、衝突之神）、「立三新」（立新的思想、新的形象、新的藝術構想），以及鼓吹「打動人」，反對「教訓人」。共匪批評該文不是「獨白」，而是「合唱」，並指其爲夏衍的「離經叛道論」的具體化，是電影界「黑幫」份子們的「反革命綱領」，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宣言書」（註八）。足見大陸電影界的反共思想與活動也是很普遍，而且有整套的綱領。

#### 五 文化大整肅

共匪在批判歷史劇、雜文、以及電影之後，立即對文化界進行大整肅。這次文化大整肅是在兩個口號下進行，一個口號是「破除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另一個是「推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共匪所謂之「三十年代文藝」，包括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十七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的所謂「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其最顯著的團體有以郭沫若爲主幹的「創造社」、以錢杏邨爲主幹的「太陽社」，以及田漢等的「南國社」。這些團體是從自由主義的新文藝運動分化出來，向匪黨投靠，而後結成「左翼作家聯盟」，完全受匪黨的控制。後一階段是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的所謂「抗日文藝統一戰線」，那些「左翼作家」，此時遂又轉入此一「戰線」之下。

其實，當時北平、武漢、以及廣州等地的文風亦盛，上海一隅的左聯時期，並不能代表「三十年代」。共匪之所以要清算「三十年代文藝」，不外基於下列諸原因：

1. 大陸文藝界大都有「今不如昔」之感，因而主張恢復三十年代的「文藝傳統」，共匪認為此項主張是向社會主義文藝進攻，並指出「寫真實論」、「現實主義深化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以及「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都是宣揚「三十年代傳統」的代表性論點，應予批判。

2. 以上海租界為大本營的左翼文壇下所產生的文藝作品，多數是以國民黨革命軍北伐為時代背景，以打倒軍閥、剷除土豪劣紳，以及抗議帝國主義在中國之侵略為口號。這些真實的時代背景，反映了中國國民黨在民族發展歷史上的許多貢獻，然而這正是匪偽政權竄改歷史的絆腳石。因此，即使沒有夏衍、田漢、陽翰笙、程季華等的宣揚鼓吹，以擴大其影響，共匪也必加以清算。

3. 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多數強調人性的善良，缺少明晰的階級觀念，因此共匪認為「三十年代文藝」雖然左傾，但並非純粹的「無產階級文藝」，非剷除不可。

4. 「左聯」雖為共匪效命的團體，但在毛共眼中，只是一種統戰性的組織，而非所謂「農兵文藝的正宗」，因而予以排斥，以便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唯一的南針」，也就是說使毛酋的文藝思想定于一尊。

「左聯」重要份子留在大陸者計有郭沫若、沈雁冰（茅盾）、夏衍、胡風、田漢等，如今大都遭到清算鬥爭，連郭沫若亦已作自我批評。甚至連當年共匪派往上海主持文藝統戰工作而近十餘年來一直總管匪區文藝工作的匪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最近亦遭到清算，成為共匪「破除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的祭品。七月十七日，匪「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同時刊載「駁周揚的修正主義文藝綱領」專文，對周揚列舉了八大罪狀：

第一、反對宣傳毛匪思想，企圖抽掉無產階級文藝的靈魂。  
第二、反對毛匪制定的為農工兵服務的文藝方向，鼓吹修正主義的「全民文藝」。

第三、歪曲匪黨的「鳴放」政策，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第四、販賣資產階級的文藝觀，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

第五、鼓吹崇洋復古，頑固地抗拒對文藝的改造。

第六、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批評，攻擊文藝戰線上的與無減資鬥爭。

第七、散佈階級鬥爭熄滅論，鼓吹「三名主義」（名作家、名導演、名演員）、「三高政策」（高薪金、高稿酬、高獎金），陰謀對整個文藝隊伍實行「和平演變」。

第八、反對匪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企圖「篡黨奪權」，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該文宣判周揚的總罪名是「一個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文藝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總頭目」，而且「這條黑線由來已久，它從三十年代一直貫到六十年代」。罪狀如此之多，歷時如此之久，迄今始予清算，實屬奇妙之事。周揚或因人性之覺醒而有反共反毛之言行，但其罪狀中顯然亦有為共匪所羅織者。左翼作家中，生者幾已一網打盡矣。

共匪「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是「解放軍報」在四月十八日的社論中提出的；其「宣傳教育要點」亦是該報於六月六日發表的，「人民日報」同日轉載，宣稱對工農、匪幹及知識份子也適用。共匪指出：「文化大革命」有破有立，其首要任務和基本目標，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就在這個「破」的任務和目標下，共匪展開了空前的大整肅。截至七月二十日止，其在文藝界先後計已清算劇作家八人（包括劇本九部）、雜文作者九人（包括雜文九種）、小說家二人（包括小說及有關論文各一件）、電影編導者二十七人（包括電影十二部）；在教育界先後被清算者計有高等學校校長、教授及黨委書記等三十人（包括高校二十三所），其中有的被撤銷一切職務、有的留校交代，有的停職反省檢查，有的被批判鬥爭，而在中等學校中，亦已開始整肅，且大都停課進行。在報社方面，已有五家報社的社長或總編輯遭受清算和免職。匪「人民日報」在五月間似亦經改組。在匪黨文化宣傳機構方面，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已被撤換，副部長除周揚遭清算外，林默涵亦被批判。至於地方文化宣傳機構被整肅者計有匪黨北平市委前後任宣傳部長楊述、李琪、山東省委文教科部長余修、安徽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陶白、匪黨中央西南局辦公廳主管宣傳的副主任張立羣、江西文化局長施龍賀（晉）、廣東文化局長錢衛、武漢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等。在匪軍中則有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等亦遭清算。目前其被清算整肅者，總數當已超過百人。



從以上跡象看來，共匪正在對中央以至地方各級文教機關、學校、團體、出版界以及知識界人士，作全面性的總清查。而其在人事總清查、總整肅中，對於組織與制度亦同時予以改組、變更、甚至摧毀，例如高等學校現行招考辦法業經廢止，學制亦將予縮短。

總之，共匪的「文化大革命」，目前正處於「大破」階段。共匪一再強調「不破不立」，但是既「破」之後，如何「立」？「立」什麼？恐怕毛匪尚未計劃及此，「破壞容易建設難」，毛匪思想業已「破產」，如今毛記偽政權或將就此「破產」矣。

## 六 結 語

(一) 共匪的文藝整風運動，半年來逐漸擴大，以對象言，由個人而及集團，以性質言，由學術而及政治。最突出者是在此次整風中，匪軍竟取代匪黨的領導地位，這是派系鬥爭和權力鬥爭的產物，但是顯然還另有一大因素存在，那就是彭德懷及其餘黨在匪軍中仍有影響力（共匪文件始終不明指彭德懷之名，而以右傾機會主義者代之），而吳晗鄧拓等可能與匪軍若干頭目有所勾結和聯繫，最低限度在反共思想上亦有共鳴之處，這是吳晗寫「海瑞罷官」為彭德懷鼓勁翻案的背景，也是共匪首先圍剿吳晗的基本原因所在。同時，吳晗的「海瑞罷官」尚代表着一種復古非今的社會思潮，其公演之後，對此思潮復有與波助浪之影響，對大陸知識份子之反共思想更發生了助長、匯合和共鳴的作用，這是共匪必須圍剿吳晗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 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實際上係以反毛為中心。「海瑞罵皇帝」影射彭德懷罵毛澤東，「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更有大量篇幅罵毛澤東。在「三家村」中，以鄧拓反毛最為積極、激烈，而且是「無孔不入、無微不至、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說什麼，鄧拓就反對什麼」，毛澤東提倡養豬，鄧拓則「大喊養狗的好處」（註九），較以往胡風之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講話」是「圖騰」，遠為尖銳。一葉知秋，今日反毛者當不局限于「三家村」的人，足見毛匪的「思想」已崩潰，共匪之所以大叫「學習毛澤東思想和著作」，就是企圖重振毛匪的「威信」。

(三) 共匪的文藝整風，已涉及到政治鬥爭和權力鬥爭，上層的明爭暗鬥，中下層的整肅和鎮壓，勢必逐漸劇烈而深入。但是，這場鬥爭，基本上

是思想鬥爭，其在學術文化界的「大革命」運動仍將繼續進行，預料共匪將對我國的歷史文化進行空前的大清算。不過，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文化在社會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礎，財產可以掠奪，思想無法沒收，「人還在，心不死」，共匪要重寫歷史、要否定固有文化，決非易事，因此，其將遭受更大的阻力與反抗是必然的、可見的。

(四) 共匪已經指出：「打着假紅旗的敵人，要比拿着白旗的敵人狠毒十倍」，「鑽到我們『肝臟』裏面來的敵人，比公開的敵人更危險得多」，同時並指認「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前途和將來的面貌的頭等大事」，「這是一場資產階級陰謀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註十）。在此「生死關頭」，共匪對於國際上的「敵人」並不介意，匪報曾譏諷國際上沒有「真正的中國通」，並嘲笑所謂「中國下一代和平演變已有希望」之說，以及「共產黨的統治還是十分鞏固」之說，都是「胡思亂想」，總是「同歷史的發展背道而馳」（註十一）。而共匪真正懼怕者，其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中，已明確指出是「蔣總統的重返大陸，並且坦白供認這股力量足以使他們『亡黨亡國亡頭』」。機運已到，國際姑息主義者可以休矣，現在該是我們同心協力，乘機反攻反共的時候了！

註一 五十五年四月二日共匪「光明日報」及四月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二 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五十年八月八日改定于北戴河。

註三 五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四 引自鮑匪蔚文等作「請看『三家村』的反動真面目」一文。原載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共匪上海「解放日報」及「文匯報」，十五日匪「人民日報」轉載。

註五 五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共匪「北京日報」。

註六 五十五年四月廿八日、五月廿一日匪「光明日報」。

註七 五十五年五月廿八日匪「人民日報」。

註八 五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匪「人民日報」。

註九 五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共匪「人民日報」。

註十 五十五年六月七日匪「解放軍報」社論。

註十一 五十五年六月一日共匪「人民日報」社論。